

外资退出与中国价值链关联： 基于外资来源地的研究

葛顺奇 李川川 林 乐*

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外资企业年报,在测算2014–2017年外资企业退出的基础上,研究了不同来源地外资退出对中国价值链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资退出整体降低了中国价值链关联,外资退出率每提高1%,价值链关联程度平均下降0.007%。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外资退出主要对下游内资企业价值链关联有负面影响,对上下游外资和上游内资的价值链关联影响不显著。拓展研究发现:美国、日本等地区外资退出显著降低价值链关联,而韩国等地区外资退出显著促进价值链关联;高资产专用性行业外资退出的负面效应更大。

关键词 外资退出 价值链关联 外资来源地 中美价值链

一 引言

近年来,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退出经营现象备受瞩目。据统计,2014–2017年共有57 058家外资企业退出中国,其中制造业企业29 027家,占制造业企业存续总量的6.2%,占全部退出企业数50.9%。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退出企业数分别为10 583家和5352家,以18.5%和9.4%的退出率位居第二、三位^①。究其原因,

* 葛顺奇、李川川(通讯作者)、林乐: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4号 300071 电子邮箱:geshunqi@vip.163.com(葛顺奇);lcc1616@163.com(李川川);linle801@qq.com(林乐)。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健全促进对外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研究”(20AZD049)和南开大学文科发展基金科学研究类项目“新时期中国知识资本导向型海外并购和经济转型升级研究”(ZX20210051)的部分成果,受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2019YJSB064)的资助。作者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建议,文责自负。

① 外资企业原始数据来自中国商务部外资企业联合年报,经作者计算。

一方面是欧美“再工业化”战略与全球税制改革推动跨国公司经营战略深度调整,另一方面是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要素价格上涨与政策规制束紧,加速了高污染、高耗能和效率寻求型外资企业退出。结合现实可以预计,中国利用外资形势严峻程度前所未有的,不仅面临中美经贸摩擦扰乱跨国公司在华经营信心、促使投资国际转移的威胁,还遭遇新冠肺炎疫情推动跨国公司供应链布局多元化、加速外资企业退出中国步伐的挑战。基于此,本文从外资来源地视角考察了外资退出对中外价值链关联程度的影响。

一直以来,外资企业凭借与国际生产网络的天然高度关联,在中国从事高复杂程度的跨境生产活动。尽管外资企业数量占比不足全国工商企业总量的3%,却创造出超五成的对外贸易,因而外资退出对国内国外价值链双循环构成重要影响。因此,对外资退出程度及其影响效应进行深入考察,不仅有助于中国打造新的引资增长点,而且能够推动中国承接高端价值链体系与增强国内国外价值链双循环活力,从而在逆全球化趋势下探索中国对外贸易新的发展路径。

考虑到外资退出对价值链关联的影响与外资技术前沿程度、行业禀赋结构密切相关,并且由于中国与来源地间分工结构、技术优势发生转变,外资退出对中外价值链关联的影响尚具有不确定性,需要结合来源地外资技术前沿程度、行业禀赋结构等特征因素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判定外资退出会降低中国与来源地间的价值链关联。

一方面,作为中国嵌入价值链的重要载体,外资凭借与全球分工体系间的供给与需求关联,深化了中国嵌入价值链的广度与深度,因而外资退出可能降低中外价值链关联。2010年外资对出口之后又返回国内的增加值的贡献度超过七成。外资对出口中蕴含的国外增加值贡献率较高,且高于总出口中的贡献度(Ma *et al.*, 2015),这意味着外资更多以后向模式嵌入价值链,即外资企业密集使用中间品从事加工组装业务,其退出将对中外价值链关联产生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缩短了与部分来源地的外资企业间技术差距,中国在价值链中的产出规模与分工地位逐步攀升,外资退出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提升中外价值链关联。2000–2014年,中国多数行业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明显。其中,高技术行业全球分工地位上升4%。以光电产业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和研发活动前向参与度明显提高,电信及光学设备制造业出口增加值接近美日等发达国家水平。与此同时,一部分外资企业仍然从事简单的加工组装业务,未能有效地提升其在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外资对中国出口的贡献度趋于降低。2006–2011年,外资出口增加值占比从52%的峰值降到45%,外资对出口最终品的增加值贡献率从峰值的57%减少到50%,垂直专业化分工从66%减少到59%(罗伟和吕越, 2019)。

综合分析,受母国市场规模、资源禀赋、技术优势和贸易结构的影响,外资退出对中国价值链分工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由于竞争效应减弱,若存续企业的承接退出企业的分工环节,将有助于提升双边价值链分工韧性;另一方面,若退出外资示范效应较大,存续企业由于技术缺乏无法承接价值链环节并弥补市场缺口,将导致市场供应链与国际生产网络被迫中断,对本行业和上下游产业价值链分工产生负面冲击。

本研究重点包含两部分内容:第一,外资退出的测度。目前已有关于外资退出的研究多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吕越等,2017;高凌云等,2017;罗长远和司春晓,2020),但由于统计标准问题存在“假退出”甚至重复进入和退出的统计问题,并且不能反映近年来外资退出趋势,更重要的是不能识别出外资具体来源地信息,进而限制了基于外资国籍异质性的分析。区别于现有研究,本文利用2014–2018年^①《外资企业联合年报》公布的权威外资企业名录,精准识别退出的外资企业名称、行业类别和来源地等关键信息,并与来源地–行业–时间维度的价值链数据相匹配;第二,研究深度方面,本文在增加值贸易核算框架的基础上,运用双边增加值贸易流分解方法,构建出能更全面衡量双边价值链关联程度的指标,从来源地视角研究异质性来源地外资退出对中国价值链关联的影响。在溢出效应分析中,本文分别从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两个视角探讨外资退出通过产品投入产出影响上下游行业价值链关联的途径,并且分别从来源地和行业资产专用性等视角进行了拓展分析。

全文余下结构为:第二部分探讨外资退出影响价值链关联的理论机制;第三部分构建外资退出和价值链关联指标,并对外资退出的现状进行深入考察;第四部分为计量模型构建;第五部分为经验分析;第六部分对溢出效应进行回归分析;第七部分基于外资来源地和行业资产专用性的视角进行异质性分析;最后为本文的结论与启示。

二 理论分析

外资企业是中外价值链关联的重要参与者,同时也是高复杂度贸易与深度价值链贸易的重要贡献者,在推动中国成为全球价值链网络核心一极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外资嵌入价值链的比重、规模、生存时间均高于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吕越等,2017)。据统计,2019年外资企业加工贸易出口总额为5900亿美元,占加工贸易出口总额80.7%。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生效后,中国商务部不再公布外资企业联合年报数据,2018年是本文能获取到的最新权威数据。

外资企业凭借其优越的国际生产网络关联深化了中国嵌入价值链的程度,并有助于国内厂商构建与国际领导型厂商间合作与融入价值链的渠道(Banga,2006;Greenaway *et al.*, 2008)。同时,外资企业通过中间品质量与价格、管理效率、技术溢出等与本土企业垂直整合(Blomström and Kokko,1998;毛其淋和许家云,2018),渗透至产业链上下游各环节并形成了“外资生态”,因而外资企业退出将影响中间品贸易与价值链结构。但是外资退出对价值链关联的影响不论是在行业内部还是关联行业之间均不能直接确定。

对行业内部而言,一方面外资企业退出行为率先切断了企业与来源地之间的中间品贸易往来,削弱了行业中间品进出口贸易强度和中间品跨境生产的复杂程度,更重要的是切断了新产品、技术等要素向本行业存续企业溢出的渠道(葛顺奇和罗伟,2015),进而可能对中外价值链关联构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外资退出降低了市场竞争程度,释放了市场空间(Markides,1995;毛蕴诗等,2005)。若国内的存续企业能够迅速吸收、占有市场份额,并整合市场资源对外拓展,则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外资退出对双边价值链的负面影响,甚至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对上下游行业而言,外资退出虽然降低了上游企业的中间产品需求、下游企业高质量的中间品投入和技术等要素的正向溢出,削弱甚至切断了存续企业与国际大型厂商合作的渠道,可能对上下游行业的价值链关联产生负面影响。但是,若退出的外资企业已经在生产、经营或管理等方面出现严重问题,处于生命周期的末端,其供求规模、产品质量与技术溢出效应早已表现出下行趋势(Haynes *et al.*,2003;吕波和王水娟,2007),那么其退出行为对上下游行业的价值链关联影响可能极其有限。接下来,本文将从行业内部和行业之间两个层面具体分析外资退出对价值链关联的影响。

首先,就行业内部水平溢出效应而言,外资企业退出对中外价值链关联的影响方向与程度取决于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的总和。竞争效应指市场导向型外资凭借高技术和低成本优势激化行业内部市场竞争;示范效应指外资企业通过技术转让和知识溢出等途径,在合作交流过程中促进内资企业提高竞争力。承接上文分析,若退出外资企业与存续内资企业间竞争效应凸显、产品同质化严重,外资企业退出后的市场份额能被存续内资企业快速吸收并实现生产规模扩张(Berry,2013;高凌云等,2017),那么双边价值链关联几乎不受影响甚至会有所提升。若退出外资企业的产品技术复杂度较高,与内资企业相比具备产品设计、研发、生产、组装和分销渠道的优势,该类外资企业退出后,同行业存续企业缺乏足够实力承接市场空间,则可能导致中国与来源地间的价值链关联降低(Lu *et al.*,2017;许罗丹和谭卫红,2003;诸竹君等,2020)。考虑到外资企业产品技术复杂度和国外增加值占比较高,本文认为外资退出对本行

业价值链关联的负面影响较大。罗伟和吕越(2019)构建了区分内外资的投入产出表,研究发现外资对出口中蕴含的国外增加值贡献度较高,外资深化了中国后向价值链嵌入,同时对出口中被贸易伙伴直接吸收的国内增加值贡献度相对较低,从增加值视角印证了外资在中国价值链中的地位。此外,中国吸引外资的主要平台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和自贸区,外资加工贸易占比高于内资,并且此部分效率寻求型外资出口中蕴含的中间品增加值较多,更倾向于使用国际中间品进行生产和开展高复杂度跨境贸易,具备较长的价值链长度,因而存续企业短期难以再生产退出企业的原产品,不能完全承接退出企业的原有市场份额,导致价值链关联强度有所减弱。

其次,就上下游行业而言,外资退出的影响取决于企业的供应链地位与溢出效应。行业间溢出效应指外资的技术、管理知识等对上下游企业的溢出效应(Javorcik, 2004; 许和连等, 2007; Kugler and Verhoogen, 2012; Du *et al.*, 2012; Halpern *et al.*, 2015)。正如上文所述,当退出企业对上下游行业的供求规模较小,供应链地位、技术等要素溢出效应较低时,其退出对中外价值链关联的影响可能不显著;而当外资具备高出口技术复杂度和产品质量,同时与上游中间品供应行业关联度高,并且通过提供高技术中间品和配套售后服务对下游厂商形成技术和知识外溢时,其退出显然会抑制上下游行业的价值链关联(王然等, 2010)。本文判断外资退出对上下游行业价值链关联的影响仍以负面为主。外资企业具有明显的示范效应和生产网络成员价值创造能力,通过增加国内中间品种类推动本土企业价值链关联和出口升级。在前向关联中,外资退出减少了行业中间品种类,降低了内资企业可获取中间品投入的范围与质量,甚至抑制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Kugler and Verhoogen, 2012; Halpern *et al.*, 2015),并且切断了存续企业模仿学习的渠道,学习成本提高和学习效率降低导致内资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优势减弱,对存续企业价值链关联不利;在后向关联中,外资退出降低了对上游企业的中间品需求,不仅削减了上游企业产品议价能力和利润加成,还减少了对上游厂商在需求产品的原料采购、生产和技术等方面的援助和支持(Blomström and Kokko, 1998; 毛其淋和许家云, 2018),从而降低了中外价值链关联。

综上所述,外资退出对中国-来源地之间价值链关联的影响并不能直接确定,需要进一步运用更为详细的外资数据与经验分析方法。

三 指标构建与现状分析

在 Koopman *et al.* (2010) 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结合 Wang *et al.* (2013) 的分解方

法,将一国整体价值链参与推广至双边-部门层面,构建从来源地视角分析外资退出对价值链关联影响的数据框架。同时本文利用高度细化的外资企业年报微观数据,统计测算了来源地外资退出情况。

(一)核心指标构建

1. 双边价值链关联——总贸易核算法。全球价值链研究的深入推进,为本文测度中国价值链分工提供了条件。Wang *et al.* (2013)将增加值进一步分解至双边-部门维度,将总出口分解为国内增加值、返回增加值、国外增加值和重复计算部分4个一级指标和16个二级指标。

本文借鉴Koopman *et al.* (2010)、唐宜红和张鹏杨(2018)及吕越和吕云龙(2019)的研究中关于价值链参与指标的度量方法,构建来源地-行业-时间维度的价值链关联指标。需要说明的是,“价值链关联”概念刻画了两个经济体之间双边价值链贸易联系的紧密、依赖程度,而“价值链参与”概念指一国在全球价值链贸易网络之中的角色和参与程度。两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表征的维度不同。由于价值链关联指标比价值链参与指标更能体现双边价值链贸易的特征与结构,特别是有助于本文分析不同来源地外资退出对双边价值链结构的影响。

一般而言,复杂价值链占总出口比重反映的是本国与来源地的单向价值链关联。同理,来源地复杂价值链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反映了来源地与本国间单向价值链关联,而双边价值链关联需要使用双边复杂价值链占双边总出口的比重测度。具体如下:

$$GVC_{jkt} = \frac{ED_{jkt} + ER_{jkt} + EF_{jkt} + EP_{jkt} + ID_{jkt} + IR_{jkt} + IF_{jkt} + IP_{jkt}}{ETEXP_{jkt} + ITEXP_{jkt}} \quad (1)$$

(1)式中, j 、 k 和 t 分别表示外资来源地、行业和年份。 GVC_{jkt} 表示第 t 年中国 k 行业与外资来源地 j 间的价值链关联, ED_{jkt} 表示中国 k 行业出口到 j 再出口的国内增加值, ER_{jkt} 表示出口后再被中国进口的返回增加值, EF_{jkt} 表示出口中隐含的国外增加值, EP_{jkt} 表示出口的重复计算部分, ID_{jkt} 表示 j 外资来源地 k 行业出口至中国后再出口的国内增加值, IR_{jkt} 表示对中国出口的返回增加值, IF_{jkt} 表示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 IP_{jkt} 表示出口重复计算部分; $ETEXP_{jkt}$ 表示中国 k 行业对 j 的总出口, $ITEXP_{jkt}$ 表示 j 来源地 k 行业对中国的总出口。外资退出对价值链关联的影响为负时,意味着分子降低的幅度大于分母,而外资退出对价值链关联的影响为正时,意味着分子降低的幅度小于分母。

2. 外资退出率。本文使用的外资企业数据源于商务部外商投资企业年度公报平台,该平台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多部委共建,数据高度权威,时间涵盖2014–2018年连续5年的外资企业数据,即2013–2017年全国外商投资企业经营信息。数据内容

包括外资企业名称、行业、外资来源地等变量,是目前能获取到的最为详细和微观的外资企业信息名录。在外资企业退出识别中,本文参考 Disney *et al.* (2005)、毛其淋和盛斌(2013)、李磊等(2019)的研究方法,若企业出现在 t 年份的联合公报中,但在 $t+1$ 及之后的联合公报中均未出现,则认定为企业在 $t+1$ 年退出。由于公报数据企业行业为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本文将企业所属行业对照到 ISIC Rev. 3 行业分类后进一步对照至 WIOD35 行业分类^①。外资企业退出率通过计算 WIOD35 行业中退出企业占本行业全部企业的比率得到。

(二) 现状分析

1. 外资企业退出的典型事实。2014–2017 年,共有 57 058 家外资企业退出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平均退出率分别为 6.56%、8.05% 和 7.21%,表 1 展示了东、中、西部地区外资企业退出情况,并选取了三个地区退出率前五的代表性省(下文自治区、直辖市等省级行政区统称省)。中部地区的江西、西部地区的甘肃和东部地区的山东分别以 13.86%、9.91% 和 8.18% 为地区退出率最高省份。外资聚集省份广东、江苏和上海的外资企业数占全国 57.46%,退出率分别为 5.61%、6.05% 和 5.01%,低于全国 6.35% 的均值。

表 1 2014–2017 年东、中、西部地区外资企业退出统计

地区	代表性省份(前五)	退出数(家)	退出率(%)
东部	山东	4667	8.18
	河北	640	7.49
	浙江	5223	7.47
	辽宁	2001	7.05
	北京	3760	6.82
中部	江西	1402	13.86
	黑龙江	266	8.08
	吉林	312	7.89
	安徽	640	7.57
	湖南	456	7.39
西部	甘肃	76	9.91
	青海	37	9.09
	贵州	134	8.6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31	8.26
	陕西	381	7.97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外资企业联合年报,经作者测算。

^① 本文被解释变量原始数据来自 ADB MRIO 数据库,该数据库将 WIOD 数据库中的国家(地区)拓展至 62 个,其行业分类与 WIOD 行业分类一致。

(二)相关性分析

图 1 进一步展示了中国与外资来源国家(地区)的价值链关联和外资退出率的情况,价值链关联变动与外资退出间的散点分布。纵轴为价值链关联数据,经由 2017 年关联度与 2014 年关联度差分得到。横轴为 2014–2017 年外资年均退出率。图中纵坐标大于 0 的点表明价值链关联度上升,中国与匈牙利、希腊、瑞典、墨西哥和西班牙之间的价值链关联度分别上升了 2.88%、2.51%、2.18%、0.79%、0.70% 和 0.20%。图中纵坐标小于 0 的点表明价值链关联度下降,中国与印度、新加坡、美国、日本、加拿大、韩国、德国、法国、英国以及祖国大陆与香港特区间的价值链关联度分别下降了 4.58%、3.11%、2.92%、2.68%、2.11%、1.54%、1.52%、0.64%、0.55% 和 0.05%。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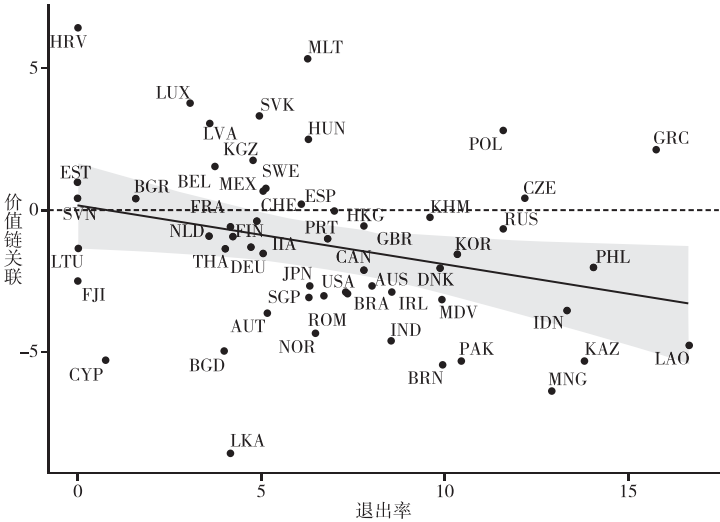


图 1 价值链关联和外资退出率①(%)

数据来源:ADB MRIO 数据库②、中国外资企业联合年报,经作者测算。

① 本文未将投资自由岛地区纳入主要外资来源地。同时由于 ADB MRIO 并未公布中国澳门地区的投入产出表,相关数据未予展示。

② 澳大利亚(AUS)、奥地利(AUT)、比利时(BEL)、保加利亚(BGR)、巴西(BRA)、加拿大(CAN)、瑞士(CHE)、中国(CHN)、塞浦路斯(CYP)、捷克(CZE)、德国(DEU)、丹麦(DNK)、西班牙(ESP)、爱沙尼亚(EST)、芬兰(FIN)、法国(FRA)、英国(GBR)、希腊(GRC)、克罗地亚(HRV)、匈牙利(HUN)、印度尼西亚(IDN)、印度(IND)、爱尔兰(IRE)、意大利(ITA)、日本(JPN)、韩国(KOR)、立陶宛(LTU)、卢森堡(LUX)、拉脱维亚(LVA)、墨西哥(MEX)、马耳他(MLT)、荷兰(NLD)、挪威(NOR)、波兰(POL)、葡萄牙(PRT)、罗马尼亚(ROM)、俄罗斯(RUS)、斯洛伐克(SVK)、斯洛文尼亚(SVN)、瑞典(SWE)、土耳其(TUR)、中国台湾(TWN)、美国(USA)、孟加拉国(BGD)、马来西亚(MYS)、菲律宾(PHL)、泰国(THA)、越南(VNM)、哈萨克斯坦(KAZ)、蒙古(MNG)、斯里兰卡(LKA)、巴基斯坦(PAK)、斐济(FJI)、老挝(LAO)、文莱(BRN)、不丹(BTN)、吉尔吉斯斯坦(KGZ)、柬埔寨(KHM)、马尔代夫(MDV)、尼泊尔(NPL)、新加坡(SGP)、中国香港(HKG)和世界其他地区(ROW)。

时本文绘制了拟合线,拟合线斜率为负表明外资退出率与价值链关联间呈现明显负相关趋势,即外资企业退出降低了与中国外资来源地间的价值链关联程度,下文对此做进一步检验。

四 模型和数据描述

(一) 计量模型的建立

为考察外资退出对中外价值链关联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GVC_{jkt} = \beta_0 + \beta_1 Exit_{jkt} + \lambda_1 z_{kt} + \lambda_2 z_{jkt} + v_k + v_{jt} + \varepsilon_{jkt} \quad (2)$$

式中,被解释变量 GVC_{jkt} 表示 t 年份中国与来源地 j 的 k 行业层面价值链关联程度;解释变量 $Exit_{jkt}$ 表示 t 年份中国 k 行业外资企业退出率; z_{kt} 表示“行业-时间”维度的控制变量,具体是中国行业规模; z_{jkt} 表示“来源地-行业-时间”维度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来源地行业规模、来源地行业劳动力收入水平和来源地行业资本密集度。 v_k 、 v_{jt} 分别表示行业、来源地-时间交叉固定效应, ε_{jkt} 表示随机扰动项。同时,本文在稳健性分析部分,将 v_{jt} 替换为 v_j 和 v_t ,同时加入了“来源地-时间”维度的控制变量,具体为经距离修正的来源地经济发展水平、中国与来源地是否缔结自由贸易协定、中国与来源地间制度距离、来源地技术水平、来源地贸易便利化水平。

(二) 变量解释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中国行业价值链关联程度,原始数据来源于 ADB MRIO 数据库。在增加值贸易核算的基础上,本文运用 Wang *et al.* (2013) 的双边-部门增加值分解方法计算得到分项指标,然后借鉴 Koopman *et al.* (2010)、唐宜红和张鹏杨 (2018)、吕越和吕云龙 (2019) 的研究方法,构建出“中国-行业-来源地-时间”维度的价值链关联指标。核心解释变量为外资企业退出率。

本文引入一系列控制变量以控制其他潜在因素的影响,具体包括:(1) 中国行业规模 ($Size_CHN$)。通常而言,中国行业规模越大,越具备规模经济效应,供应链越稳定、高效和完善,开展对外贸易的优势越大,越有助于促进双边价值链关联。预期符号为正。(2) 来源地行业规模 ($Size_partner$)。行业产出是影响价值链关联的重要因素。行业产出越高意味着行业内部分工越细化,对价值链关联的促进效应越大。行业规模数据来自 ADB MRIO 数据库,预期符号为正。(3) 来源地行业劳动力收入水平 ($Labor$)。劳动力收入通过企业生产成本效应推动企业生产工序的分割、转移,从而影响价值链贸易,预期符号不确定。(4) 来源地行业资本密集度 ($Capital$)。资本密集度变动将影

响行业的投入产出结构,进而影响行业参与全球生产网络,预期符号为正。行业劳动力收入和行业资本密集度数据来自 WIOD 数据库^①。

“来源地-时间”维度的控制变量为:(1)经距离修正的来源地经济发展水平(*gdp*)。通常而言,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内市场需求和国内产业分工程度密切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国内市场产品需求越旺盛,国内产业生产工序分割程度越细化,中外价值链关联程度就越深。同时,本文纳入距离对双边价值链的影响,参考 Méon and Sekkat(2008)、杨宏恩等(2016)的方法,使用经双边地理距离修正的来源地经济发展水平,即 $gdp = \text{来源地 } GDP / \text{与来源地地理距离}$ 。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中国与来源地是否缔结自由贸易协定(*FTA*)。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关税和非关税减让等条款降低了贸易壁垒及贸易成本,促进了中间品贸易。数据源自中国自贸区服务网。(3)中国与来源地间制度距离(*Institution*)。制度距离引发了贸易摩擦解决机制不对等、协调困难的担忧,同时制度距离引发的交易成本阻碍了贸易商的正常市场行为与价值链贸易开展,不利于双边价值链关联。本文参考黄新飞等(2013)的方法构建出双边制度距离指标并取倒数。(4)来源地技术水平(*Technology*)。技术水平影响产业技术转移,是制约产品全球生产布局的重要性因素。技术水平越高的国家,参与跨国生产分工的能力和程度越高。本文使用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国家技术水平的代理变量,数据源自佩恩世界表(PWT 9.1)。(5)来源地贸易便利化水平(*Facilitation*)。贸易便利化不仅有助于削减交易成本和降低交易周期的不确定性,而且能降低机会成本,从而提高贸易效率,促进双边价值链关联。本文参考刘斌等(2019)的方法构建贸易便利化指标。更直观的归纳整理结果见表 2。

表 2	变量的定义、测算方法与数据来源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及单位
<i>Size_CHN</i>	中国行业规模	中国行业产出规模,百万美元
<i>Size_partner</i>	来源地行业规模	行业产出规模,百万美元
<i>Labor</i>	来源地劳动力收入水平	行业劳动力收入,百万美元
<i>Capital</i>	来源地资本密集度	行业资本密集度,百万美元
<i>gdp</i>	距离调整的来源地经济发展水平	GDP/双边地理距离
<i>FTA</i>	与来源地是否缔结 FTA	缔结 FTA 取值 1,否则取 0
<i>Institution</i>	与来源地间制度距离	参考黄新飞等(2013)
<i>Technology</i>	来源地技术水平	来源地全要素生产率(参考 PWT 9.1)
<i>Facilitation</i>	来源地贸易便利化水平	熵值法,参考刘斌等(2019)

① ADB MRIO 数据库尚未公布社会经济账户数据,本文将 WIOD2016 数据库中的变量滞后得到。

(三) 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价值链关联原始数据源自 ADB MRIO 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了 2014–2017 年 35 个 WIOD 行业分类下 62 个经济体的“来源地–行业–时间”维度数据。上述经济体占中国利用外资的比重超过九成,因此本文将 ADB MRIO 数据库中的中国以外的经济体作为中国外资来源地。外资退出率数据源自商务部 2014–2018 年外商投资企业年度公报(2013–2017 年度企业信息)。本文将企业所属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转换至 WIOD35 行业分类,并与价值链关联数据匹配。

五 回归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基于模型(2)的外资退出对中外价值链关联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见表 3。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4)
<i>Exit</i>	-0.0080 *** (-2.65)	-0.0082 ** (-2.57)	-0.0069 ** (-2.01)	-0.0070 ** (-1.99)
<i>Size_CHN</i>			0.0355 *** (3.49)	0.0347 *** (3.30)
<i>Size_partner</i>			0.0029 *** (8.13)	0.0029 *** (7.98)
<i>Labor</i>			-0.0367 *** (-3.74)	-0.0367 *** (-3.68)
<i>Capital</i>			0.1314 *** (4.45)	0.1426 *** (4.45)
常数项	0.0657 *** (217.56)	0.0657 *** (212.72)	-0.4264 *** (-3.09)	-0.4151 *** (-2.91)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来源地固定效应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来源地–时间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R ²	0.809	0.811	0.839	0.840
观测值	4624	4624	3318	3318

说明:括号内为纠正了异方差后的 t 统计量;*、**和***分别代表 10%、5%和 1% 的显著性水平。下表同。

表3的(1)(2)列为仅引入外资退出变量估计的结果,其中(1)列控制了来源地、行业和时间固定效应,(2)列控制了来源地-时间交叉固定效应。外资退出变量估计系数为负,并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外资退出降低了双边价值链关联。为了进一步控制可观测因素的影响和观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在(3)(4)列中引入控制变量,外资退出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负,并且控制变量估计系数显著。这表明外资退出对价值链关联的抑制作用比较稳健。综上,外资退出不利于中外价值链关联,外资退出率每提高1%,价值链关联程度平均降低0.007%。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中国行业规模和来源地行业规模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行业规模扩张推动了生产分工的细化和转移,延伸了产品的国际生产阶段数和复杂程度,促进了双边价值链关联。来源地劳动力收入水平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来源地更高的国内劳动要素成本不利于双边价值链关联。来源地行业资本密集度变量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显著为正,表明行业资本密集度越高,对企业生产工艺、流程和工序分割转移的推动作用越大,有助于来源地企业凭借资本优势与中国开展价值链贸易,因而推动了中外价值链关联。

(二)内生性的处理

1. 遗漏变量处理。上文分析表明,外资退出显著抑制了中外价值链关联。为了考察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在基准估计方程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添加了“来源地-时间”维度的控制变量和更为严格的交互固定效应以控制潜在的遗漏变量问题导致的估计偏误,具体估计结果详见表4。表4的(1)-(3)列均加入“来源地-时间”维度控制变量,其中(2)列控制行业-时间固定效应,(3)列进一步控制来源地-时间固定效应,核心解释变量外资退出的估计系数依然为负且显著,表明本文的研究结果是稳健的。

表 4	稳健性估计结果		
	(1)	(2)	(3)
<i>Exit</i>	-0.0069 ** (-2.02)	-0.0072 ** (-2.07)	-0.0074 ** (-2.06)
<i>gdp</i>	0.0103 (0.10)	0.0027 (0.02)	
<i>FTA</i>	-0.0002 (-0.10)	-0.0005 (-0.22)	
<i>Institution</i>	-0.0968 (-0.90)	-0.0970 (-0.89)	

(续表4)

	(1)	(2)	(3)
<i>Technology</i>	0.0010 (0.06)	0.0014 (0.08)	
<i>Facilitation</i>	0.0169 (0.13)	0.0123 (0.10)	
<i>Size_CHN</i>	0.0355 *** (3.49)		
<i>Size_partner</i>	0.0029 *** (8.12)	0.0029 *** (8.01)	0.0029 *** (7.86)
<i>Labor</i>	-0.0370 *** (-3.77)	-0.0368 *** (-3.81)	-0.0365 *** (-3.68)
<i>Capital</i>	0.1312 *** (4.39)	0.1316 *** (4.34)	0.1430 *** (4.40)
常数项	-0.4176 *** (-2.93)	0.0661 * (1.92)	0.0558 *** (33.65)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来源地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行业-时间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来源地-时间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R ²	0.839	0.842	0.844
观测值	3318	3317	3317

说明:为了直观展示结果,本文在报告中展示了相关单独项的固定效应。

2. 逆向因果关系处理。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会影响估计结果的准确性。本研究可能存在内生性原因:外资企业经营战略对一国生产分工布局极为敏感,双边价值链关联的变动可能影响到外资企业生存,进而导致互为因果关系。寻找合适、有效的外资退出率工具变量非常困难也具有挑战性,参考已有研究,本文从双边关系的视角出发,运用中国-来源地联合国投票相似度作为外资退出率的工具变量,以克服潜在逆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选取联合国大会投票相似度作为工具变量具有合理性。从相关性方面而言,联合国大会投票与外资退出率有较高的关联度。联合国大会投票相似度能反映双边政治关系的紧密程度,而政治关系深刻影响了跨国公司的经营策略(闫雪凌和林建

浩,2019)。受投资成本影响,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对双边政治关系极为敏感,即当双边政治关系变差时跨国公司基于经营风险、交易成本以及声誉等因素,将减少投资。良好的政治关系与双边政治互信,为本国企业提供投资机会、安全背书和高层制度解决争端的可能性(Nigh and Schollhammer,1987)。政治关系友好,不仅减少了外企投资经营潜在的交易成本,增强外企投资信心,而且更有助于企业获得政府优惠贷款和税收补贴,吸引母国投资(Biglaiser and Derouen,2007),从而降低了外企退出率;政治关系越远,政府及消费者对外资企业的好感度越差。政府对外企实施严格的监管、市场准入、签证程序等投资障碍和行政惩戒措施,压缩了外企的生存空间(Che *et al.*, 2015),推动了外资企业加速退出。

从外生性方面而言,联合国大会投票相似度对价值链关联并没有直接和明显的影响。从理论分析看,第一,双边贸易依存度与其政策目标间关系极为复杂,各国驻联合国代表的投票是基于双边意识形态、战略协作、国内法规、现实利益等多方面权衡博弈的结果,中间品贸易并非投票选择的至高目标,而且双边“政冷经热”“政热经冷”现象经常存在,甚至部分敌对国家间贸易依存度较高,即联合国大会投票相似度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并不能确定。对于企业而言,由于存在“沉没成本”,企业寻找可替代的市场和构建新的贸易关系网络所引致的成本远远高于维持现有贸易关系的成本(Davis and Meunier,2011);第二,不同于传统贸易方式,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各国依据技术、成本等优势参与生产环节,其所依赖的国际供应链体系与全球价值链地位等因素制约了企业出于政治风险考量而改变当前稳定的贸易关系,双边联合国投票博弈对多边贸易的效应较小甚至没有显著影响(Martin *et al.*, 2008),军事冲突等双边极端政治关系恶化行为对价值链贸易的影响较小。因此双边联合国投票相似度变动对价值链贸易的影响机制并不成立。

从目前已有研究看,Ross(2006)研究发现,其他国家对中国贸易与同中国在联合国投票倾向性间的相关关系并不明显。特别是在增加值贸易体系下,双边价值链关联程度取决于涉及第三国的复杂增加值贸易,双边政治冲突对多边贸易的效应较小甚至没有显著影响(Martin *et al.*, 2008)。联合国会议投票相似度刻画了两国在政治诉求中的一致性,更能体现双边政治关系(Dixon and Moon,1993;Morrow *et al.*, 1998; Kastner,2007),因此本文将联合国会议投票相似度作为外资退出率的工具变量。

表5的(1)(2)列分别报告了运用核心自变量滞后1期和联合国投票相似度作为工具变量时的两阶段最小二乘第二阶段的结果,外资退出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Anderson-Rubin Wald 检验、Stock-Wright LM S 统计量和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均拒

绝了工具变量是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表明本文对工具变量的选取是满足相关性要求的。 综上表明,在运用了工具变量克服潜在的逆向因果问题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旧稳健。

表 5	两阶段最小二乘第二阶段结果		
	(1) <i>L. Exit</i>	(2) 投票	(3) GMM
<i>L. GVC</i>			0. 2338 *** (10. 35)
<i>Exit</i>	- 0. 0502 ** (- 2. 01)	- 0. 0185 ** (- 2. 47)	- 0. 0357 *** (- 6. 61)
<i>Size_CHN</i>	0. 0057 (0. 27)	0. 0359 *** (3. 57)	0. 0177 *** (5. 57)
<i>Size_partner</i>	0. 0027 *** (10. 16)	0. 0029 *** (12. 54)	0. 0140 *** (38. 68)
<i>Labor</i>	- 0. 0337 ** (- 2. 09)	- 0. 0369 ** (- 2. 47)	- 0. 0429 (- 1. 22)
<i>Capital</i>	0. 1224 ** (1. 98)	0. 1352 *** (2. 60)	- 0. 1714 *** (- 5. 54)
常数项	- 0. 0393 (- 0. 13)	- 0. 4635 *** (- 3. 22)	- 0. 2515 *** (- 5. 91)
第一阶段 F 统计量	56. 14	802. 32	
Anderson-Rubin Wald 检验	58. 62 *** [0. 0000]	659. 28 *** [0. 0000]	
Stock-Wright LM S 统计量	4. 25 ** [0. 0392]	6. 11 ** [0. 0135]	
Anderson canon. corr. LM 统计量	58. 617 *** [0. 0000]	659. 283 *** [0. 0000]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	56. 143 { 16. 38 }	802. 324 { 16. 38 }	
R ²	0. 834	0. 838	
观测值	2413	3318	2413

说明:[]内为 P 值,{ }内为 Stock-Yogo 检验 10% 水平上的临界值。(1)(2)列控制了行业、来源地-时间固定效应,(3)列控制了时间、来源地-行业效应。

GMM 方法通过构造包含参数的方程,以解决内生性问题,不需要假定变量分布和了解随机扰动项分布,因此本文使用动态系统 GMM 方法再次进行了估计,考虑到因变量可能存在路径依赖特征,本文引入价值链关联的 1 阶滞后项(*L. GVC*)。(3)列报告了使用动态系统 GMM 的估计结果,外资退出对价值链关联的估计结果仍然显著为负。

六 溢出效应分析

产业间投入产出关联,特别是中间品投入产出关联能更为直观和有效地衡量产业间的溢出效应,外资的技术、管理、研发创新等溢出效应很大程度上依附于产业间的产品贸易,基于产业部门间的要素投入关联(特别是中间品投入产出关联)更能直观、有效的衡量外资在部门间的技术溢出效应。因此,基于区分内外资的产业间投入产出表,能更为有效地考察外资产业间溢出效应,特别是对内资的溢出效应。参考 Lu *et al.* (2017)、诸竹君等(2020)的方法,本文构建出外资溢出效应指标:

上游外资退出关联指标(*Forward*),衡量上游外资行业 f 向下游行业 k 出售中间品时形成的前向溢出效应:

$$Forward_{kt} = \sum [_{f \neq k} (input_{kft} / \sum_f input_{kft}) \times Exit_{ft}] \quad (3)$$

上式中, $input_{kft}$ 表示行业 k 使用的源自上游外资行业 f 的中间品, $\sum_f input_{kft}$ 表示行业 k 源自上游行业 f 全部的中间投入品, $Forward_{kt}$ 表示外资退出的上游溢出效应。

下游外资退出关联指标(*Backward*),衡量下游外资行业 b 向上游行业 k 采购中间品时形成的后溢出效应:

$$Backward_{kt} = \sum [_{b \neq k} (output_{kbt} / \sum_b output_{kbt}) \times Exit_{bt}] \quad (4)$$

$output_{kbt}$ 表示行业 k 向下游外资行业 b 销售的中间品, $\sum_b output_{kbt}$ 表示行业 k 对下游行业 b 出售的全部中间投入品, $Backward_{kt}$ 表示外资退出的下游溢出效应。同理,后向溢出效应可以进一步分为外资退出对外资企业的后向溢出效应(*Backward_F*)和外资退出对内资企业的后向溢出效应(*Backward_D*)。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将 OECD AMNE ICIO 数据库中的 2013–2016 年数据滞后 1 年后与回归数据匹配,运用上一年部门间投入产出的结构分析外资退出的技术溢出效应,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使用当年部门投入产出结构分析的内生性影响。

基于模型(2),本节进一步引入前、后向溢出效应相关变量,进而考察外资退出形成的溢出效应。回归结果见表 6,其中因变量均为中外价值链关联。表 6(1)列分别报告了外资退出对上下游行业的总体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外资退出对本行业价值链关联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对上游行业和下游行业价值链关联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结合理论分析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为,退出市场的外资企业很大程度上在需求规模、采购标准、质量要求和技术水准等方面呈现下行趋势,因而其退出对上下游企业的

表 6

溢出效应估计结果

	(1) 总体	(2) 外资	(3) 内资
<i>Exit</i>	-0.0069 ** (-1.96)	-0.0071 ** (-2.00)	-0.0070 ** (-2.00)
<i>Forward</i>	0.0011 (0.38)		
<i>Backward</i>	-0.2764 (-1.41)		
<i>Forward _F</i>		-0.0716 (-0.65)	
<i>Backward _F</i>		0.0815 (0.08)	
<i>Forward _D</i>			-1.0097 ** (-2.36)
<i>Backward _D</i>			-0.0681 (-0.64)
<i>Size_CHN</i>	0.0358 *** (3.37)	0.0353 *** (3.34)	0.0273 ** (2.30)
<i>Size_partner</i>	0.0029 *** (7.97)	0.0029 *** (7.98)	0.0029 *** (7.96)
<i>Labor</i>	-0.0367 *** (-3.67)	-0.0367 *** (-3.69)	-0.0366 *** (-3.67)
<i>Capital</i>	0.1424 *** (4.44)	0.1428 *** (4.45)	0.1422 *** (4.48)
常数项	-0.1801 (-0.84)	-0.4235 *** (-2.95)	0.6088 (1.25)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来源地-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R ²	0.840	0.840	0.841
观测值	3318	3318	3318

产出规模和技术水平的影响相当有限,即外资退出后释放的市场空间被迅速整合与吸收,外资退出的影响被大幅度削弱了。(2)列报告了外资退出对上下游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前向溢出效应(*Forward_F*)和后向溢出效应(*Backward_F*)估计系数表明,外资退出对上下游外资企业价值链关联的影响不具备统计显著性,这可能是由于外资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中间投入品和最终需求品的供应链更具多元化和韧性,面临上下游外资企业供应链断裂问题时能迅速寻找到替代供应商以降低影响,因而外资退出不能显著的影响上下游外资价值链关联。(3)列报告了外资退出对上下游行业内

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前向溢出效应(*Forward_D*)估计系数表明上游外资退出显著地降低了下游内资企业的价值链关联,上游行业外资退出率提高1个单位,下游行业内资企业价值链关联强度降低约1个单位,这是由于上游外资企业向下游内资企业供应了大量高质量的中间投入品,外资退出后短期内降低了内资企业中间品采购的种类、质量,削减了内资企业技术学习的渠道,不利于下游内资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后向溢出效应(*Backward_D*)估计系数不具备统计性显著性,表明上游内资企业能迅速吸收下游外资减少的需求,因此下游外资企业退出并未显著影响上游内资企业的价值链关联。

七 拓展分析

(一) 外资来源地视角

外资在来源地层面具有鲜明的技术异质性特征,因而不同来源地外资退出对中国价值链关联具有异质性影响。具体而言,随着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升级,中国与外资来源地间相对分工地位发生了转变,即内资企业比较优势提升,内资在与来源地间价值链关联中的作用更大。若退出的外资其产品拥有较高的技术复杂度,技术、管理等要素的溢出效应明显,在中国具备较高的供应链地位,但迫于政治、生产布局等不确定性因素撤离中国,那么此部分外资退出对中外价值链的关联负面影响最大;若外资在某些产业部门具备先进技术优势,此部分外资退出将对双边价值链关联产生负面影响;若外资在华经营夕阳产业,面临产能、技术和产品被限制或淘汰的风险时,由于内资企业相关产品已非常成熟,产能充足,竞争激烈,此部分外资退出会降低行业竞争程度,有益于资源整合,从而更好地对外开展产能合作,促进双边价值链关联。

本文拓展研究了不同来源地外资退出对价值链关联的影响差异,并运用交互项方法对比考察了不同来源地间外资退出的影响方向、程度与显著性。表7报告了样本中每个来源地外资退出率对双边价值链关联的估计系数。不难看出,在估计系数方向、绝对值大小和显著性方面,不同来源地间差异极为明显。具体而言,美国(USA)、日本(JPN)等地区外资退出显著降低了中外价值链关联,美资退出对中美价值链关联的负面影响较大。美资企业退出率每提高1%,中美间价值链关联降低约0.1%。美、日等国技术水平较高,位于国际生产分工体系的上游。内资与美日等外资技术水平差距大,内资企业多采用技术转移而非技术创新的方式来提高产品竞争力,因而高度依赖外资技术。外资退出扩大的市场规模并不能被国内企业及时吸收,原因在于技术差距等因素导致了国内企业无法承接此部分生产环节。德国(DEU)、法国(FRA)、瑞士(CHE)

表 7

拓展分析 I

(1)		(2)		(3)	
AUS	-0.0215 [*] (-1.96)	GBR	0.0231 (0.85)	POL	0.0141 (1.62)
AUT	-0.0010 (-0.33)	GRC	0.0424 ^{**} (1.97)	PRT	-0.0225 (-1.06)
BEL	0.0169 (1.25)	HRV	-0.0179 (-1.10)	ROM	-0.0085 (-1.12)
BGR	0.0281 (0.34)	IDN	-0.0042 (-0.06)	RUS	0.0075 (0.39)
BRA	-0.0128 (-0.53)	IND	-0.0095 (-0.61)	SVK	0.0255 (1.64)
CAN	-0.0571 ^{**} (-2.52)	IRL	0.0043 (0.87)	SWE	-0.0165 ^{**} (-1.98)
CHE	-0.0503 ^{***} (-2.97)	ITA	-0.0310 (-1.10)	TUR	0.0074 (1.41)
CYP	0.0141 (1.35)	JPN	-0.0416 ^{***} (-3.25)	TWN	0.0438 ^{**} (1.99)
CZE	-0.0340 ^{***} (-2.82)	KOR	0.1384 ^{***} (2.58)	USA	-0.0952 ^{***} (-8.17)
DEU	-0.0383 ^{**} (-2.43)	LUX	-0.0284 (-1.28)	<i>Size_CHN</i>	0.0332 ^{***} (3.13)
DNK	-0.0330 [*] (-1.92)	LVA	0.0072 (0.84)	<i>Size_partner</i>	0.0027 ^{***} (7.42)
ESP	-0.0123 (-0.67)	MEX	0.0182 ^{***} (5.15)	<i>Labor</i>	-0.0339 ^{***} (-3.47)
EST	0.0014 (0.11)	MLT	0.0330 (1.39)	<i>Capital</i>	0.1307 ^{***} (4.06)
FIN	-0.0371 (-1.53)	NLD	-0.0089 (-1.39)	常数项	-0.3941 ^{***} (-2.74)
FRA	-0.0311 ^{***} (-2.80)	NOR	-0.0028 (-0.49)	R ²	0.845
				观测值	3318

说明:估计中控制了行业、来源地-时间固定效应。

以及北欧(DNK、SWE)外资退出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是由于中欧在高技术领域合作紧密,上述地区外资退出形成的市场空缺难以被内资或其他地区外资弥补,因而双边价值链关联受到负面影响。希腊(GRC)、韩国(KOR)、墨西哥(MEX)和中国台湾(TWN)撤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是由于随着中国分工地位的相对攀升,国内竞争效应提升,国内企业迅速吸收退出外资释放的市场后,通过市场整合扩大了对来源地的出口,这些地区资本退出促进了双边价值链关联。值得关注的是日韩撤资估计结果存

在较大差异。虽然日韩主要投资于中国的制造业,但韩资为效率寻求型,对中国技术转让程度低,而日资为市场寻求型,与中国市场的技术合作较为充分。

(二)资产专用性视角

在资产专用性方面,专有核心技术、专利、管理技能、营销诀窍等是投资的重要优势之一(王进猛和沈志渔,2010),同时也是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品工序细化和复杂价值链的决定性因素。外资企业的高资产专用性更是强化了其在推动价值链深度嵌入中的重要地位(李国学和张宇燕,2010)。外资退出减少了行业高附加值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负面冲击了行业中间品贸易等价值链关联模式。同时,外资退出切断了技术、知识等外溢的渠道,割断了低级供应商嵌入领导型企业搭建的价值链体系的重要渠道,降低了中国与来源地间的价值链关联。本文进一步考察高资产专用性行业外资退出的影响。本文借鉴 Nunn(2007)、盛丹和王永进(2010)及刘斌等(2019)对资产专用性的研究方法,测算不同行业资产专用性,方法如下:

$$\varphi_k = \sum_{k'=1}^n \theta_{kk'} R_{k'}^{neither} \tag{5}$$

上式中 $\theta_{kk'}$ 表示 k' 行业向 k 行业的投入份额。 $R_{k'}^{neither}$ 是 k' 行业中不属于“机构交易产品”(organized exchanges),也没有“参考价格”(reference price)的产品占比。 φ_k 为 k 行业的资产专用性,其越大,表明 k 行业资产专用性越高。本文构建外资退出率与行业资产专用性的交互项,再次进行了估计。表 8 报告了相关估计结果,交互项结果显著为负,表明行业资产专用性越高,外资企业退出对中国价值链关联的负面效应越大。

表 8	拓展分析 II	
	(1)	(2)
交互项	-0.0473 * (- 1.71)	-0.0743 ** (- 2.20)
<i>Exit</i>	0.0034 (0.53)	0.0143 ** (2.04)
<i>Size_CHN</i>		0.0580 (1.21)
<i>Size_partner</i>		0.0057 *** (7.01)
<i>Labor</i>		-0.0208 (- 1.09)
<i>Capital</i>		-0.0131 (- 0.36)

(续表 8)

	(1)	(2)
常数项	0.0838 *** (167.38)	-0.7382 (-1.12)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来源地-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R ²	0.789	0.810
观测值	2398	1664

八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外资企业年报数据为基础,在增加值贸易分析框架下深入探讨了外资退出对中国-来源地间价值链关联的异质性影响,考察了外资退出对上下游内外资价值链关联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不同来源地外资退出对价值链关联的结构性影响。

研究发现,外资退出总体上显著降低了中国与外资来源地间的价值链关联,该结论在克服内生性问题之后仍然稳健。拓展研究发现:第一,美国、日本等具备相对分工优势地区的外资退出显著降低了价值链关联。第二,由于重点行业贸易互补性,法国、德国和北欧等地区的外资退出不利于价值链关联。第三,韩国等地区的外资退出促进了价值链关联。第四,专用性资产在外资分工优势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高资产专用性行业外资退出对价值链关联的不利影响更大。

本文研究结论的启示如下。第一,理性看待效率寻求型外资退出。随着中国在全球分工中地位提升和劳动力成本提高,低效率型外资将加快转移和退出的步伐,此部分外资退出有助于中国改善在价值链网络中形成的路径依赖,破局“低端锁定”效应。中国应以外资退出为契机构建高质量外资体系,实现产业转型和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第二,警惕和预防高质量外资撤离。在中美经贸摩擦与新冠肺炎疫情重大不确定性影响下,中国应警惕美、日、法、德、北欧等技术先进地区的外资撤离,注重打造先进制造业引资增长点,为承接高端价值链转移至国内创造有利的政策和市场环境。第三,进一步扩大外资开放领域与投资便利化水准,高效通过中欧双边投资协定利用欧洲技术与资本,特别是扩大高资产专用性行业外资利用水平,承接高端价值链环节的外资进入,增强嵌入价值链的韧性和深度,以有效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对外资供应链的威胁。最后,随着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意愿与能力降低,中国应增强自主创新的内生

动力,培育发展创新型先进制造业,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高端制造业分工体系,并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产业特征,积极引导外资的有序转移退出。

参考文献:

- 高凌云、屈小博、贾朋(2017):《外商投资企业是否有更高的退出风险》,《世界经济》第7期。
- 葛顺奇、罗伟(2015):《跨国公司进入与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研究》,《经济研究》第11期。
- 黄新飞、舒元、徐裕敏(2013):《制度距离与跨国收入差距》,《经济研究》第9期。
- 李国学、张宇燕(2010):《资产专用性投资、全球生产网络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世界经济研究》第5期。
- 李磊、王小霞、蒋殿春、方森辉(2019):《中国最低工资上升是否导致了外资撤离》,《世界经济》第8期。
- 刘斌、王乃嘉、李川川(2019):《便利化与价值链参与——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的分析》,《财经研究》第10期。
- 罗伟、吕越(2019):《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世界经济》第5期。
- 罗长远、司春晓(2020):《外商撤资的影响因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研究》,《世界经济》第8期。
- 吕波、王水娟(2007):《产业演变对跨国公司撤资的影响研究》,《求索》第10期。
- 吕越、刘之洋、吕云龙(2017):《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持续时间及其决定因素》,《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6期。
- 吕越、吕云龙(2019):《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环境效应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7期。
- 毛其淋、盛斌(2013):《贸易自由化、企业异质性与出口动态——来自中国微观企业数据的证据》,《管理世界》第3期。
- 毛其淋、许家云(2018):《外资进入如何影响了本土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经济学(季刊)》第4期。
- 毛蕴诗、蒋敦福、曾国军(2005):《跨国公司在华撤资——行为、过程、动因与案例》,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盛丹、王永进(2010):《契约执行效率能够影响FDI的区位分布吗?》,《经济学(季刊)》第4期。
- 唐宜红、张鹏杨(2018):《中国企业嵌入全球生产链的位置及变动机制研究》,《管理世界》第5期。
- 王进猛、沈志渔(2010):《外资进入方式对交易成本的影响:实证检验及政策建议》,《中国工业经济》第7期。
- 王然、燕波、邓伟根(2010):《FDI对我国工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 响及机制——基于产业关联的视角》,《中国工业经济》第11期。
- 许和连、魏颖绮、赖明勇、王晨刚(2007):《外商直接投资的后向链接溢出效应研究》,《管理世界》第4期。
- 许罗丹、谭卫红(2003):《外商直接投资聚集效应在我国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第7期。
- 闫雪凌、林建浩(2019):《领导人访问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世界经济》第2期。
- 杨宏恩、孟庆强、王晶、李浩(2016):《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投资协定异质性的视角》,《管理世界》第4期。
- 诸竹君、黄先海、王毅(2020):《外资进入与中国式创新双低困境破解》,《经济研究》第5期。
- Banga, R. “The Export-Diversifying Impact of Japanese and U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in the Indian Manufacturing Secto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6, 37(4), pp. 558–568.
- Berry, H. “When Do Firms Divest Foreign Operations?”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3, 24(1), pp. 246–261.

- Biglaiser, G. and DeRouen, Jr K. "Following the Flag: Troop Deployment and U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07, 51(4), pp. 835-854.
- Blomström, M. and Kokko, A.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Spillovers."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1998, 12(3), pp. 247-277.
- Che, Y.; Du, J.; Lu, Y. and Tao, Z. G. "Once an Enemy, Forever an Enemy? The Long-Run Impact of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from 1937 to 1945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5, 96(1), pp. 182-198.
- Davis, C. L. and Meunier, S. "Business as Usual? Economic Responses to Political Tens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2011, 55(3), pp. 628-646.
- Disney, S. M.; Naim, M. M. and Potter, A.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E-Business on Supply Chain Dynam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2005, 89(2), pp. 109-118.
- Dixon, W. J. and Moon, B. E. "Political Similarity and American Foreign Trade Pattern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1993, 46(1), pp. 5-25.
- Du, L.; Harrison, A. and Jefferson, G. H. "Testing for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Foreign Investment Spillovers in China, 1998-2007."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12, 23(3), pp. 234-243.
- Greenaway, D.; Mahabir, A. and Milner, C. "Has China Displaced Other Asian Countries' Exports?"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8, 19(2), pp. 152-169.
- Halpern, L.; Miklós, K. and Adam, S. "Imported Inputs and Productivi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5, 105(12), pp. 3660-3703.
- Haynes, M.; Thompson, S. and Wright, M., "The Determinants of Corporate Divestment: Evidence from a Panel of UK Firm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2003, 52(1), pp. 147-166.
- Javorcik, B. S.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crease the Productivity of Domestic Firms? In Search of Spillovers Through Backward Linkag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4, 94(3), pp. 605-627.
- Kastner, S. L. "When Do Conflicting, Political Relations Affect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007, 51(4), pp. 664-688.
- Koopman, R.; William, P.; Zhi, W. and Shang-Jin, W. "Give Credit Where Credit is Due; Tracing Value Added in Global Production Chain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6426, 2010.
- Kugler, M. and Verhoogen, E. "Prices, Plant Size, and Product Quality."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12, 79(1), pp. 307-339.
- Lu, Y.; Tao, Z. G. and Zhu, L. M. "Identifying FDI Spillover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7, 107, pp. 75-90.
- Ma, H.; Wang Z. and Zhu, K. F. "Domestic Content in China's Exports and Its Distribution by Firm Ownership."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5, 43(1), pp. 3-18.
- Markides, C. C. *Diversification, Refocusing,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USA: MIT Press, 1995.
- Martin, P.; Thierry, M. and Mathias, T. "Make Trade Not War?"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8, 75(3), pp. 865-900.

- Méon, P. G. and Sekkat, K.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Trade: Which Institutions? Which Trade?" *Economic Inquiry*, 2008, 46(2), pp. 227–240.
- Morrow, J. D.; Siverson, R. M. and Tabares, T. E. "The Political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Major Powers, 1907–1990."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8, 92(3), pp. 649–661.
- Nigh, D. and Schollhammer, H.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olitical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The Asymmetric Response Hypothesis." *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 1987, 8(4), pp. 307–312.
- Nunn, N. "Relationship-Specificity, Incomplete Contracts,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7, 122(2), pp. 569–600.
- Ross, R. S. "Balance of Power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China: Accommodation and Balancing in East Asia." *Security Studies*, 2006, 15(3), pp. 355–395.
- Wang, Z.; Wei, S. J. and Zhu, K. F. "Quantifying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Sharing at the Bilateral and Sector Level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9677, 2013.

Impact of FDI Outflows on China's Value Chain Linkages: A Study Based on Different Sources of FDI

Ge Shunqi; Li Chuanchuan; Lin Le

Abstract: Drawing on the annual reports of foreign-funded firms, this paper calculates the rate of FDI outflows from China between 2014 and 2017, and examines the impact of FDI outflows on bilateral value chain linkages between China and different sources of FDI. The study reveals that FDI outflow behaviour generally reduces China's overall value chain linkages. For every 1% increase in the outflow rate, the degree of value chain linkages decreases by 0.007% on average. Research on spillover effects indicates that FDI outflow behaviour mainly and negatively affects the value chain linkages of downstream domestic firms, and has an in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value chain linkages between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foreign-funded firms and upstream domestic firms. Additional study concludes that outflows from region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significantly reduce value chain linkages, while outflows from South Korea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se linkages. FDI outflows from high asset-specific industries show an even greater negative effect on linkages.

Key words: FDI outflows, bilateral GVC linkages, sources of FDI, Sino-US GVC

JEL codes: F14, F21, F23

(截稿:2021年2月 责任编辑:宋志刚)